

評巴博德（Burton Pasternak） 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 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 和一些研究反思¹

文 / 陳東昇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行政專員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）

書名：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
（*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*）

作者：巴博德（Burton Pasternak）

主編：黃宣衛

翻譯：吳佩瑾、林彥岑、許可欣、劉容貴、賴郁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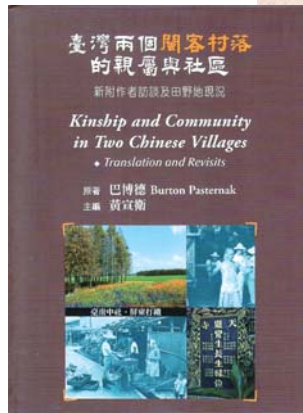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：苗栗／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

出版時間：2021年2月

頁數：352頁

一、前言

本書之英文原著作者為巴博德（Burton Pasternak, 1933-）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（Columbia University）博士，紐約市立大學（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）榮譽教授，研究領域為社會組織、社會人口學、生態學與中國研究。²本書原文本係作者於1960年代，在臺灣南部兩個閩、客村落的調查成果，後續於1972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中心（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）出版的*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*。



參考文獻

- Chen, Shao-Hsing. 1966. Taiwan as a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. *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* 14: pp. 1-14.
- Ingold, Tim. 2017. Anthropology contra Ethnography. *Hau: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*, 7(1): 21-26.
- 丁仁傑，2013，《重訪保安宮：漢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
- 2021〈書評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的現況》〉，《臺灣風物》，71（2），頁195-203。
- 孔邁隆，2016a《孔邁隆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（上）：家的合與分－臺灣的漢人家家庭制度》臺北：巨流圖書。
- 2016b，《孔邁隆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（下）：客家的法人經濟、宗教、語言與認同》，臺北：巨流圖書。
- 王銘銘，1997，《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》，北京，三聯書店。
- 2005，《繼承與反思：記雲南三個人類學田野工作地點的「再研究」》，刊於潘乃谷、王銘銘編，《重返「魁閣」》，頁：152-193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朱云云、姚富坤，2010，《江村變遷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- 周大鳴，2006，《鳳凰村的變遷：《華南的鄉村生活》的追蹤研究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林浩立，2018，〈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齣：人類學家評《全員在逃》〉<https://gu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670>（2021/6/23擷取）
- 段偉菊，2004，〈大樹底下同乘涼——《祖蔭下》重訪與西鎮族群認同的變遷〉，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26卷第1期，頁39-45。
- 洪耀蘭，2008，〈批判、詮釋與再現：客家研究與美濃社會運動的對話〉，收錄於《多元族群與客家：臺灣客家運動20年》，新竹市：臺灣客家研究學會，頁183-203。
- 莊孔韶，2000，《銀翅：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：1920-1990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。
- 陳綺華，2004，〈人類學漢人親屬研究：回顧與展望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23卷，頁1-12。
- 焦大衛，2012，〈戰後臺灣的變遷及其在民間宗教活動上的影響〉，於焦大衛著，丁仁傑譯，《神、鬼、祖先：一個臺灣農村的民間信仰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有限公司。
- 黃宣衛，2021，〈中譯本導論〉，於巴博德著，黃宣衛主編，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，苗栗縣銅鑼鄉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出版，頁9-33。
- 黃應貴，2014，〈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臺灣的困境〉，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3期，頁230-244。
- 褚建芳，2014，〈宗教、道德與社會整合——從芒市傣族社會形態及其變遷反思韋伯命題研究〉，《思想戰線》第6期第40卷，頁44-49。
- 蔡嘉信，2016，〈「社區」如何被研究：1960-1970年代的研究取徑及其內容〉，《思與言：人文與社會學期刊》54卷2期，頁291-331。

¹ 感謝詹素娟、吳翎君兩位指導教授督促筆者閱讀本書，並與筆者分享相關看法，筆者獲益甚多，然本文如有缺失，文責仍由筆者自負。

² 詳參：紐約市立大學網頁：<http://www.hunter.cuny.edu/anthropology/faculty-staff/professors-emeriti>（取用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）

本書中譯本的主要編著者為黃宜衛，英國聖安祖大學（St. Andrews University）博士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，也長期於國立東華大學任教。研究領域為文化人類學，研究區域以臺灣東部為主，著有專書與地方志（或合著）數本，也主編不少研究論文集，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，學術能量甚強。³

黃宜衛在〈中譯本導論〉中，已開宗明義本書在編輯過程，除了翻譯之外，還加上2020年完成的作者訪談稿，以及邀請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邱秀英博士，與新營社區大學的蔡佩如博士，分別協助進行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與臺南市六甲區的中社村（現為里）「田野現場再調查」，有助於讀者理解兩個村落的現今概況。（巴博德 2021：9-11）因此，我們除了閱讀巴博德在1960年代的第一手調查整理，也能看出這兩者村落的歷史變遷，或可從中看出臺灣社會演變的脈絡。

本書出版訊息公布後，已經引起跨學界的關注與轟動，相信也有不少同道人士對本書有濃厚興趣，進而撰寫書評。與此同時，筆者不禁反思，作為一個歷史學門學院中的研究生，這本書的撰寫與編譯再出版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呢？因此，本文除了針對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成果，還有翻譯本中的新增內容進行討論，也希望在1960-1970年代，西方學界大量進入臺灣調查的背景脈絡中，指出這波風潮對於臺灣歷史學界（特別是臺灣史）的影響。然筆者畢竟才疏學淺，難免疏漏，尚祈方家不吝指正。

二、內容簡介

本書除〈前言〉說明研究緣起與調查經過，共分成五個章節，以及〈新增中譯本導讀〉及三個附錄，分別簡述如後。

〈中譯本導讀〉由主編黃宜衛主筆，簡要介紹本書原作者背景，讓讀者能快速掌握作者的學科訓練及學術軌跡。接著說明本書翻譯緣起，以及如何組成田野調查團隊，和延攬翻譯工作

的陣容，其目的在於盡量忠於原著。黃宜衛也指出，雖然西方的田野調查方法曾在1920年代傳入中國，並於1930年代開始顯著影響，但又於1950年代因政治因素中斷。臺灣的人類學研究，則是以日治時期歷史學派為主流，復加白色恐怖陰影壘罩，更鮮少碰觸與現實生活有關的議題。在冷戰氛圍下，來到臺灣研究的西方學者，主要是將臺灣作為中國鄉村的一例，替代改革開放前難以抵達的中國本土。（頁14）

編者更進一步認為，原作者以村落／社區的研究方式，成功挑戰過去Maurice Freedman（斐利民）有關繼嗣理論（descent theory）的研究範式，也增進本地人類學者對漢人社會的研究興趣。1970年代，李亦園、王崧興等人開展對漢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工作，以及後續的「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流流域自然與文化史料研究計畫」（簡稱濁大計畫），使漢人社會研究呈現多元繽紛的局面。這也說明「漢人」並不是一個整體，而是歷史過程中不斷形成、演變，當然也沒有一個所有漢人共享的文化傳統。（頁21）而田野現場再調查更具有多重意義，其一是翻譯所需，再者係能瞭解田野地點的當代變化，見證臺灣社會的改變。如今，臺灣研究在學術上的意義已不再是中國的替代品。（頁29）

第一章〈導論〉以大綱式的說明，明確指出打鐵村與中社村的不同，前者是客家人村落，後者則是閩南人村落。打鐵村並未出現強力的父系世系群（patrilineages），而中社村卻有明顯的繼嗣群（descent groups），父系扮演重要角色。作者認為，兩者之間的差異，不能簡單以都市化或種族起源解釋，反而需要探討是什麼樣的社會、地理與經濟特質，造成兩者明顯差異。（頁46）接著，作者便介紹兩個村落各自的環境，像是打鐵村的環境較中社村更適合農耕，但這些差距並不是很明顯，若非長期觀察恐怕也不易發現。

第二章〈農業〉，作者開頭指出兩個村落的生計都仰賴農耕，因此分析他們的農業資源取得過程，以及農業生產活動，是相當重要的步驟。（頁65）打鐵村的部分，有高比例的外地地主與佃耕，土地租賃與購買會避免親友，以免價格尷尬。灌溉層面，無論是相關團體或是灌溉管理人，都與親屬關係無關，反而後者多是經濟弱勢的村民。村莊之間有勞力交換的情況，互相幫助的案例多於雇用員工，隨著抽水機更新與耕耘機的引進，對外勞力需求更顯著，只是村

³ 詳參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網頁：<https://tinyurl.com/2chwpuzh>（取用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）

民偏好配合度高的客家人。資本和貸款，傳統的穀會成員與親屬關係連結不強，主要原因還是害怕尷尬。

中社村則是在土地部分，幾乎都掌控在特定繼嗣群手中，出售時也會盡量尋求繼嗣群內買家。這裡的水源並不充足，需要輪耕，大部分仰賴降雨，合作機會不多，直到灌溉系統更新後開始出現偷水現象。勞力組織多來自鄰近成員，故親屬比例較高。資金和信貸，中社村並沒有穀會類似組織，主要受限於一年的收穫期太長，私人借貸反而更彈性，地主便成為最主要的資金來源，連結到父系團體在地方上的領導地位。整體來說，打鐵村除了農業灌溉優勢，近年也開始種植香蕉的現金作物，以及農業團體輔助，近年發展較中社村佳。

第三章〈親屬〉，打鐵村的婚姻與姻親關係，因為經濟活動需要大量合作，呈顯出跨父系親屬、同村庄鄰里優先的現象，大大擴展人脈，婚喪儀式同樣是以鄰里組成居多，更有「父母會」幫忙喪家。若是無法產子，打鐵村的人傾向收養無血緣關係的孩子，即使只有女兒也盡量避免招贅。二戰結束後，產業變遷導致人口外流，女性地位提高、父系連結減弱，世系群祭祀公業組織也不復見。（頁116-121）這些對於父系親屬依賴較低的原因，很有可能是因為父系親屬的土地掌握程度相對較低。

中社村的家庭數與人口顯著成長，而且與自然增加比較相關，婚姻會以擴大姻親連結範圍為原則，盡量選擇外村的配偶，以此避免與近親結婚，這裡的儀式活動也較打鐵村強調父系親屬連結，但沒有「父母會」組織。收養兒子會從近親領養，養女卻都沒有血緣關係，比較像是收養女傭，同時招贅情況也比較常見。中社村在戰後的人口外流也顯著，不過即使分家後也對父系親屬認同感很高，應該是因為繼嗣群掌握村內的土地比例很高，是打鐵村的六倍面積。

第四章為〈村落整合性〉，打鐵村村長的聲望與權威有限，需要透過其他鄰長或戶長的授權才能代表發言，規模較大的姓氏群體影響力相對更大，但沒有任何單一繼嗣群能夠壟斷控制村落。隨著時間演變，權威與影響力漸漸跟著教育和經濟開始普及。打鐵村也表現出較為團結的氛圍，不論是社區整合或是儀式祭拜，都沒有表現出家族或世系群領導的模樣。

中社村卻明顯由賴家主宰社區事務，其他民眾對公眾事務關心程度不高。雖然賴姓世系群具領導地位，也有派系之分，但是面臨外部挑戰者仍會團結整合。這裡的村民鄰居多是父系親屬，跨親屬協會的數量一直不多，甚至儀式祭拜團體的區分方式是富人、窮人的差異。

第五章是〈差異的因素〉，作者透過前述的田野調查與資料分析，指出打鐵村因為強調結社互助使得父系關係淡化，在祭祀公業也能發現有效融合各父系群體，然而中社村卻是以繼嗣群為主，彼此合作機會較少。透過其他田野案例的比較，作者認為「都市化與工業化」和「族群」因素應能排除。進一步爬梳資料，發現「日本殖民政策」應該是重要的原因，日本總督府經常施壓於打鐵村的祭祀公業，使得跨親屬聯繫較強的打鐵村迅速崩解，二戰後也難以回復。至於「早期移居的性質和條件」則是另一項重要因素，打鐵村基於邊陲的安全防衛需求，建立起不同家庭和世系群分支的密切合作，而中社村開墾的風險較低，反而更需要擔心灌溉問題，所以父系群的合作需求也較低。（頁180-191）不過隨著國家控制力量進入，村民間的合作需求會開始增加，更具有凝聚力。因此，作者認為中國地方的村庄⁴發展取決於許多條件，不可變的（起源、氣候、土壤等）；可變更的（農業技術、農作物、政府政策等），沒有定律可循。（頁200-201）

〈附錄一〉為口述歷史，作者說明自己因為服役而有機會到亞洲，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，取得獎學金到臺灣進行調查，因為當時中國並非合適的田野地點。作者回憶到，除了健康外，臺灣保守的社會對於陌生臉孔也是挑戰，特別是他的孩子，所幸他很快就和村民建立關係、取得信任，也理解到當地臺灣人對於「外省人」的剝削並不喜歡。後來，因為中國開放，作者便轉移田野地點至中國了，最特別的經驗應該是與費孝通（1910-2005）的對談。可惜的是，中國沒有意願完全接受外國人類學家的調查。作者返回美國後，於1995年退休，同時將興趣轉移至其他地方，對中國與臺灣的瞭解已不如以往。

〈附錄二〉是打鐵村的重新田野調查內容。首先要面臨的困難就是原書的報導人年紀增長、人口外流，但經過數十年，臺灣地方研究興起，已有《新埤鄉志》可以參考。隨著時代變遷，個人隱私觀念加強，土地財產部分多不願透露；科技進步後，鑿井灌溉可以改善水源紛

⁴ 當時臺灣成為中國封閉下的替代田野地點。

爭；不變的是，天后宮仍是村內重要信仰中心。拜現今科技發達所賜，不論是地圖繪製或是相片拍攝，都已經比原書方便許多。⁵不過邱秀英等人指出，透過天后宮等廟宇的匾、梁柱或桌邊的捐贈名單等史料，應該有助我們釐清村莊的長期歷史發展。筆者認為，這可能是當時作者巴博德的學科背景不同，加上關注的並非長期歷史發展，而沒有進一步分析的內容。

〈附錄三〉則是中社村（里）的重新田野調查。中社里的人口雖然成長，但呈現老化現象，因為火車站的交通便利，里內的林鳳營反而有較好發展。受惠於水庫保持供水穩定，稻米耕種已經打響名號，雖然中社里還是以務農為主，但大地主的權勢已經不如過去。民安宮一直是信仰中心，宋江陣更享譽全國，凝聚居民向心力。不過特別的是，六甲區至今尚無專屬的鄉鎮志，使得大家想要瞭解該地歷史文化，除了透過臺南市政府出版品外，巴博德的作品更是重要的著作。

三、綜合評論

戰後隨著美國現代化理論與區域研究興起，西方學者開始對東亞地區展開調查，臺灣當時便成為中國對外封閉的替代地點。（張隆志 2010：104）丁仁傑曾指出，在康乃爾大學（Cornell University）人類學系的Lauriston Sharp（1907-1993）教授影響下，Bernard Gallin首先來彰化埔鹽鄉調查，之後還有Arthur Wolf（1932-2015）在海山溪洲，以及Norma Diamond（1933-2011）調查臺南市四鯤鯓，他們先後成為人類學中國研究專家。（丁仁傑 2016：130）到了1975年，更有一位影響臺灣史研究甚深的人類學系博士生來到臺灣，在王世慶（1928-2011）等人帶領下，於臺北三峽和樹林展開訪談，為臺灣平埔族研究提供重要論點，此人便是John R. Shepherd。（張隆志 2016：VII）確實如張隆志所說，這一波來自西方的浪潮，特別是社會科學理論、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的結合，成為歐美歷史與人類學者對中國社會研究的典範。（張隆志 2009：168）

西方學者所帶入的社會科學理論，與田野調查方法都是當時臺灣學術界所欠缺的，經由長期的田野觀察，可以補足底層社會文獻紀錄不足。本書也從經濟活動與環境因素等條件，分析

打鐵村與中社村的發展差異，特別是打鐵村因為邊陲地帶的防衛需求，而非展出跨父系親屬的合作模式。若非親自蹲點調查這麼長的時間，恐怕是難以打入村民生活圈中，進而取得口訪論述與田野資料。本書在重新編譯後，也能看出編輯團隊的用心，盡量將專有名詞的翻譯重新放回歷史脈絡中，使非專業領域的讀者也能掌握重點。更顯而易見的，從英文原文書名與中文翻譯書名的對照，就能清楚知道本書的田野調查場域為臺灣村落，這便映證自1960年代至今，臺灣社會發展與演變的軌跡。

而這波西方學者來臺調查的風潮，對歷史研究者又有何影響呢？首先，人類學者所引進的田野調查方法，告訴我們歷史研究不能只從文獻紀錄著手，因為這些資料除了可能不盡完善，還是透過他人之手而寫，親臨現場更有助於我們理解研究主體。如清代地方志的傳抄傳統便是如此，許多地方資料可能已過時或是不真實。

其次，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學者會不斷回到田野地點，重新進行調查研究，更新及延續舊有的知識脈絡，避免研究與現況變化出現太大落差。再者，跨學科的方法論引進，有助於我們分析不同地區的差異條件，透過相似的案例進行比較研究，加深我們的研究厚度。雖然就現在的觀點看來，本書對於地方知識的認識可能有落差，但我們應該清楚認知到，這是在當時研究基礎較為缺乏的時空背景所誕生的作品。亦即，我們應該在該作品書寫的時空背景中看待這本書籍的貢獻，避免以後見之明過度嚴厲評論，才能取得更適當的評價。

或許本書受限於當時臺灣史研究尚未真正開展，許多文獻資料並不充足，歷史背景論述較少。但時至今日，臺灣已有不少出色的鄉鎮志，都履行了實地調查、因地制宜的書寫架構，不再是一成不變的重複抄寫，使得地方知識與時俱進。⁶這些著作正是提醒我們回到歷史研究的根本，先詳讀基礎文獻與先前研究，再配合實地考察與口訪，佐證資料正確性並更新資訊，藉以加強我們的研究深度。

加諸本書原作者並未持續耕耘本研究的後續調查，使得後續發展與驗證中止。至此，我們更能理解本書重新編輯出版時，為何要再加入兩個村落的現況調查，如此有助我們以更新、更

⁵ 如天后宮、文財公、伯公與五營的地圖標示。

⁶ 如尹章義總編纂，2010，《續修五股鄉志》。新北：五股鄉公所。

完善的田野調查方法，對照與理解臺灣社會發展的脈絡。筆者更透過本書的閱讀，得到幾個提示：紮實的研究方法、詳實的田野調查、詳盡的史料解讀。同時若能積極與國外交流研究經驗，更有助於我們重視本土研究史料，進而與地方各界積極合作。

四、對臺灣史研究的反思

若我們回顧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，便能知道當時研究臺灣史實在是處處險境。許雪姬曾說，楊雲萍是戰後開創臺灣史研究的先驅，（許雪姬 2010：74）正凸顯研究臺灣史的孤寂。雖然有「臺灣省文獻會」推動編纂《臺灣省通志》、出版《文獻叢刊》（今臺灣文獻），也有民間發起的〈臺灣風土〉（今《臺灣風物》）⁷，（許雪姬 2010：74-78）但基本上仍是處於中國史下的地方史，臺灣史一直沒有主體性，研究議題也受到限制。不過值得一提的是，1957年起周憲文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任職期間，發起編輯的《臺灣文獻叢刊》309種，為日後的臺灣史研究奠定基礎。（張隆志 2010：108-109）這樣的政治局勢籠罩臺灣許久，反而在海外較能從事臺灣相關研究。（許雪姬 2010：81-82）

眾人皆知，提到Arthur Wolf 來臺灣調查經驗，無不立刻聯想到王世慶的身影。前者1959年來臺進行漢人家庭與童養媳研究時，王世慶是在地文獻專家，其母親則是童養媳出身，對於當地童養媳文化瞭若指掌，就在這樣的機緣下兩人交情日益深厚。（翁佳音 2003：244）而後，任職於史丹佛大學的Arthur Wolf 於1970年再度來臺，在臺期間邀請王世慶隔年赴美，以樹林的移民與信仰圈為主題發表論文。（許雪姬、劉素芬、莊樹華 2003：199）就此開啟王世慶於大臺北海山地區的研究路程，1971年6月發表《臺灣省通志·人民志·宗教篇》，10月又參加Arthur Wolf 舉辦的「中國社會的宗教與禮俗會議」，還有後續諸多著作。（溫振華 2003：11-1）1974年到1978年間，王世慶又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（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）支持下，搜集1,218件臺灣族譜，（張隆志 2010：109）貢獻不可說不大，影響臺灣研究（特別是臺北地區）相當深遠。

1970年代，由張光直主持的「濁大計畫」，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推動的「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劃」，都是這波浪潮的影響。（張隆志 2009：169）其中，濁大計劃更促進現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，成為目前臺灣史研究的重鎮。在當時政治環境中，若非來自西方學界的刺激，臺灣學界的轉變恐怕沒有這麼快速。

而後，Arthur Wolf指導的John R. Shepherd於1975年來臺，同樣在王世慶等學者帶領下，進入臺北三峽和樹林展開訪談。他所帶入的研究方法與觀點，對臺灣學界產生許多刺激，像是他所提出的清國「理性國家說」，與施添福的「國家剝削論」，還有後續柯志明主張的「歷史機遇論」，都是清代臺灣治理的重要論述，也可以說是清代臺灣史研究必讀書目。

2018年，John R. Shepherd接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邀請，再度來臺演講，地點選在他當初田野地點的三峽，與在地的國立臺北大學合辦，具有重要意義（圖1）。會後，John R.



圖1 2018年John R. Shepherd（前排左二）在國立臺北大學進行演講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教授提供）

⁷ 《臺灣風物》創刊於1951年，發行人為陳漢光，楊雲萍擔任主編，宋文薰、曹永和、賴永祥等協助編輯，該刊物強調「傳承《民俗臺灣》的精神及特色」，並隨著臺灣史研究的興起，刊物也越來越「學術化」與「專業化」，自十七期起長期由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贊助，2017年亦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，其於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詳參：莊宏年，2021，〈《臺灣風物》編輯成員年表〉，《臺灣風物》70卷（1）：135-154。〈臺灣風物資料庫簡介〉，《臺灣風物》：<https://folkways.twcenter.org.tw/about/intro.jsp>。取用日期：2021年7月8日。



圖2 John R. Shepherd 與昔日田野調查翻譯劉秀媛小姐再會首
(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教授提供)

Shepherd更到昔日田野地點，與當時田野調查的陪同兼翻譯女學生再會首(圖2)。由王世慶到協助翻譯的劉秀媛小姐，除了代表世代傳承，也是一種跨國度的認識，與跨文化的交流，這是臺灣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歷史記憶，更成為臺灣歷史發展中的一筆重要註腳。

後續，雖然因為中國開放，許多人類學者轉向中國調查，來臺人數減少許多，但仍然不乏對臺灣研究有興趣的西方學者。目前較為人知的例子，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(Paul R. Katz)特聘研究員，於1988-1989年間，在中央研究院臺灣田野研究室(今臺灣史研究所)擔任首位訪問學人，就此開啟長期的宗教史研究。⁷其目前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開設的「臺灣民間信仰發展史專題」，Philip Clart、James L. Watson、Arthur Wolf 與 Stephan Feuchtwang

(依課綱出現順序排列)等西方研究者的著作，仍是必讀書目。不正是說明了這一波1960-1970年代西方學者來臺灣調查的風潮，還持續影響著臺灣學界呢？而本書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，正提醒我們記得回顧這段歷史發展，好好珍惜得來不易的臺灣史研究環境。

參考文獻

- 丁仁傑，2016，〈臺北三峽地方史中的人類學觀察〉，《臺灣文獻》67(4)：125-156。
-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編，2003，《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：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。
- 尹章義總編纂，2010，《續修五股鄉志》。新北：五股鄉公所。
- 巴博德(Burton Pasternak)原著、黃宜衛主編，2021，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。苗栗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。
- 李世偉主編，2019，《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—宋光宇教授紀念文集》。新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- 邱秀英、賴郁如，2021，〈附錄二 重返打鐵：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的田野紀實〉。頁237-276，收錄於黃宜衛主編，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。苗栗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。
- 邵式柏(John R. Shepherd)著、林偉盛等譯，2016，《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(1600-1800)》。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。
- 康豹(Paul R. Katz)，2019，〈東西學界的橋梁—悼念宋光宇老師〉，李世偉主編，《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—宋光宇教授紀念文集》。新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年，頁426。
- 張隆志，2009，〈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16卷(4)：161-184。
- 張隆志，2010，〈拾貝於婆娑洋畔、美麗島間：一個學院臺灣史研究者的觀察札記〉，《思想》16：101-120。
- 張隆志，2016，〈導讀〉，收錄於邵式柏(John R. Shepherd)著、林偉盛等譯，《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(1600-1800)》。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頁VII。
- 許雪姬，2010，《臺灣史研究三部曲：由群學經顯學到隱學》，《思想》16：71-100。
- 許雪姬、劉素芬、莊樹華訪問、邱慧君紀錄，2003，《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。
- 蔡佩如，2021，〈附錄三 重返田野：臺南市六甲區中社里〉。頁277-334，收錄於黃宜衛主編，《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：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》。苗栗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。

⁷ 康豹(Paul R. Katz)，2019，〈東西學界的橋梁—悼念宋光宇老師〉，李世偉主編，《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—宋光宇教授紀念文集》。新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年，頁426。